



# 汉学主义

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

顾明栋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897

# 汉学主义

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

顾明栋 著

张强 段国重 冯涛 等译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美)顾明栋著；  
张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210-9

I. ①汉… II. ①顾… ②张… III. ①汉学—研究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200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 汉学主义

——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

[美]顾明栋 著

张强 段国重 冯涛 等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210-9

---

2015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定价：46.00元

## 中文版前言

从1998年国外首次出现 Sinologism(汉学主义)一词,到2004年厦门大学周宁教授在国内首先使用“汉学主义”一词,屈指数来至今已有十多年了。笔者2010年初发表第一篇“汉学主义”的文章,其后在国内杂志上陆陆续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汉学主义的文章,至今也有五年了。与国内出版速度相比,国外出版周期相对较长,笔者2009年向卢特里奇出版社提交了《汉学主义》的书稿,但直到2013年方才在伦敦和纽约得以出版。而在国内,经过不到两年时间,《汉学主义》的中文版就问世了。

时至今日,“汉学主义”作为一个理论范畴虽不能说已为学界广泛了解和接受,但至少已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了。“汉学主义”一词自首次出现以来,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和构建,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深化成熟的过程,其内涵与外延变得愈来愈复杂,但是,其发展的轨迹还是清晰可循的。起初,它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因而可以说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翻版。在汉学研究领域,它成了汉学中的“东方主义”变体。后来,学者们意识到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不足和缺憾,为了适应中国文化自觉和学术创新的需要而重新构思这一范畴,使其逐步演变成一个受“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但又有别于这两种西方理论的独立理论体系。在国内,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范畴和批评话语被接受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2010年10月19-21日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和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共同举办的“汉学主义:理论探索”国际研讨

会；二是《跨文化对话》2011年第28辑刊登了一个探讨汉学主义的专题讨论。在此之后，国内一些主流学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专门探讨汉学主义的文章，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范畴和批评话语逐渐变得清晰和成熟起来。经过十多年时间的积淀，是到了对汉学主义的理论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汉学主义》中文版的问世，可以使学界较为全面地了解汉学主义的理论，认识其价值和不足，促成对“汉学主义”的反思，深化这一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化理论。

笔者一直坚信，学术问题应该进行公开、文明、理性的争论，即使有尖锐的批评意见也无妨，实际上，正如芝加哥大学治学传统的一个信念所言，对一个学者的最大尊重就是向其提出最尖锐的问题。但在中国讲究温柔敦厚的语境下，我认为，用温柔的语言提出尖锐的问题也许是解决学术问题的更佳方式。在“汉学主义：理论探索”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十多位知名学者对汉学主义的问题开展了热烈、认真、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有学者对笔者的发言提出强烈的理性质疑，甚至对一些观点表示完全不赞成，但由于质疑者秉承正确的学术争鸣态度，激烈的思想交锋并未沦为意气用事的攻击或文人相轻，争论结果使笔者和与会者都获益匪浅。

国内学者对汉学主义现象其实是有深刻的反思的，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编过一本《汉学(中国学)研究导论》，书中收集了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关于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论文。虽然论文的作者们没有使用“汉学主义”的概念，但他们表达的不少观点正是汉学主义理论的思想。比如张西平教授说：“我们想通过正常的批评，纠正那种仿佛只要洋人讲的就没错的‘殖民地思想’，把对汉学(中国学)的引进和批评统一起来，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商讨和研究，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学术态度。对国外汉学(中国学)家的成果也不可盲从，正像对待所有的学术成果都不应盲从一样。”<sup>1</sup>他还表示：“引进

1 张西平，《汉学(中国学)研究导论》，原文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所引的出处均见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网站公布的文章。网址是：<http://www.sinologybeijing.net/cn/detail/12759>。

域外汉学(中国学)是为了我们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万不可在介绍西方汉学(中国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时,我们自己看花了眼,真成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他还触及了我们提出汉学主义理论的初衷:

中国学者应努力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使世界的汉学(中国学)论坛上中国的声音,有中文的发言,而不总是西方的语言,西方的声音,西方的标准,“仿佛‘中国’是一个缺席者,空出来的那个座位总是有异邦人在李代桃僵地对理论家们进行‘中国的叙述’,而中国学者却总是心有不甘却满脸无奈地看着这一空缺的座位”。

当然,我们提出汉学主义的理论,着眼点并不完全是应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促进汉学研究和国学研究。汉学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自我反思,反思的对象既有本土文化霸权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共谋,也有学界的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反思的目的是要恰当认识西方他者的智慧,在其基础上获得自我开放的视野和自信的心态,正确认识本土文化和学术的价值与不足,从而为发掘本土文化和学术资源,将其与外来的思想与学术资源相结合,产生全新的、具有真正世界意义的学术成果。在这一意义上,提出汉学主义理论甚至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国内的人文社科研究,而是旨在认清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以智性殖民为核心的文化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是如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造成中国学界把西方学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奉为普世真理的偏颇倾向,为焕发中国学术的创造力和原创性而摇旗呐喊。

由于“他者殖民”和“自我殖民”的双重作用,中国学术和学术界的文化无意识根深蒂固,欲清除其造成的精神殖民这一任务无比艰巨;不以西方学术为准绳,而以其为攻玉的他山之石,建立独立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则更是任重道远。中国学术(包括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欲向更具原创性的高层次发展,需要在大力引进西方学术成

果的同时克服随之而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惰性,汉学主义的批评理论和反思范式也许会有助于中国学术思想的解放,成为复旦大学葛兆光先生呼唤的“涵盖了中国,亚洲和西方的顶级世界理论”的助产士。

但愿《汉学主义》的中文版能为中国学术的振兴贡献绵薄的力量!

《汉学主义》中文版得以问世多亏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首先,英国卢特里奇出版社慷慨地把该书的中文版权不计报酬地归还给作者,对此,笔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南京大学的周宪教授一直对本书欣赏有加,承蒙他向数家出版社推荐,最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独具慧眼,决定出版拙作的中文版。笔者对他们为促进学术进步而做的努力和专业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笔者应该特别感谢帮助笔者把拙作翻译成中文初稿的译者们,由于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包括我自己)在不同的时候翻译了不同的章节段落,笔者已无法确切计算参与翻译者的工作量,但其中主要译者有张强、段国重、冯涛,参与翻译的还有周领顺、陈月红、陶丽君、钱春霞、缪海涛、薛武、帅慧芳、吴娟等。笔者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文字,并对译文的初稿进行了全面的校对、修订和润色,因此,译文存在的错误或缺憾都应由笔者负责。最后,笔者还想借此机会感谢达拉斯德州大学孔子学院为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所提供的种种帮助。

# 目 录

|                   |     |
|-------------------|-----|
| 序 (J. 希利斯·米勒)     | 1   |
| 致谢                | 9   |
| 导论 超越东方主义         | 13  |
| 第一章 知识与文化无意识      | 31  |
| 第二章 汉学、汉学主义及后殖民主义 | 69  |
| 第三章 汉学主义的历史批判     | 103 |
| 第四章 认识论的意识形态      | 141 |
| 第五章 方法论的意识形态      | 168 |
| 第六章 知性无意识         | 204 |
| 第七章 政治无意识         | 237 |
| 第八章 语言研究的汉学主义     | 267 |
| 结论 一个自觉反思的理论      | 305 |
| 参考文献              | 317 |
| 索引                | 331 |



## 序

J. 希利斯·米勒

xiv

我很高兴能为顾明栋教授的杰作《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写序,这令我感到十分荣幸。《汉学主义》是一本极为重要而且非常及时的书。顾教授学识渊博,才学精深,观念新颖,是华裔学者中为数不多的精通中西语言、学术和文化的翘楚,中英文都有优秀的学术论著面世。在那些致力于中西文学、文论、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学者中,他走在了前沿。在他的专业领域,他已出版了两本英文专著,发表了40余篇英文文章。他令人羡慕地掌握了中国从古代到当代的材料和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拉康、德里达的文艺批评理论。很少有学者能像他那样将其对汉语和自己领域的熟练掌握与在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受过的西方批评理论的高级训练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想找到中西材料可以得到公平比较的共同理据,二是强调中国传统具有与西方传统不同的原创性和价值。

顾教授的第一本书《中国诠释学与开放诗学》(*Chinese Theor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 Route to Hermeneutics and Open Poetics*)对此主题进行了非常深刻的研究。他的观点是,近代西方思潮中所谓文艺作品是开放的、可以有多种阐释(例如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著

述)的看法,与中国诗学从古至今一以贯之地信奉类似西方“开放文本”的传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从古代《诗经》、《周易》的阐释和现代的文本入手,对这一“开放性阐释传统”进行了渊博而又具体的描述。他还推论道:“中国的阐释传统经历了一个与西方传统相似的从封闭性诠释到开放性诠释的发展过程。”但他又说:“中国传统到达这一目的地走过的是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顾教授的第二本书《中国小说理论——一个非西方的叙事系统》(*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同样是学识渊博而且富有原创性的。我觉得或许最有趣的一点是,他认为《红楼梦》这本18世纪的中国“小说”(如果你觉得可以用西方这一术语称谓的话)已采用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另外很有价值的是他对中国古典小说中人名寓意性与小说诗学关系的探讨。顾教授对他所研究的文本之细节有着独特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则取决于他对汉语语言和文学的精通。

这是两本杰出而又富有创新的专著,我从中获益匪浅。顾教授的学术论文也同样精湛。在此我只想提及其中两篇,以说明他的深厚学养以及为了撰写新著《汉学主义》而做的准备工作。他的一篇文章“重新概念化语言的鸿沟——中西文字符号理论比较”(Reconceptualizing the Linguistic Divide: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the Written Sign)是我读过的有关西方拼音文字与中国略带表形文字之间令人费猜的差异问题最好的一篇。他在旁征博引皮尔斯、索绪尔和拉康等人的理论以及中国人对中国文字符号的论述之后,令人信服地阐明,中国的文字混合了象形和拼音的因素,这与西方以语音为中心的文字是截然不同的;这个观点同时也支持了诸如雅克·德里达等人较早时候所持的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立场。这个例子说明在学术领域有争议的议题上顾教授是愿意谨慎地采取立场的。

另一篇文章是“中国的比兴与西方比喻”(Chinese Bixing and Western Metaphor)。该文梳理了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比喻论,并将其与微妙的中国比兴论做了一个比较。在他不厌其烦的、详实的

诠释中,我开始理解什么是“比”什么是“兴”,它们之间有何区别,它们与比喻看似相似,又到底有什么不同。这篇文章特别有价值的一点是作者对《诗经》中“比兴”用法做了详尽的探讨。以上两篇论文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它们以详尽的中西实例证明了顾教授对中西材料几乎少见的掌握程度,从而使他有资格在这部新书中从事富有挑战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汉学主义》是非常及时且在观念上富有原创性的著作,也是至今为止顾教授最杰出的著作。它是顾教授多年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关系日益紧密的当下,全面研究西方世界怎样建立起对中国的认识,探讨这些认识是否恰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美国,电视新闻、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像《纽约时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导和文章。美国总统和国会也一直在针对中美关系方面做一些重要的政治决策和通过一些法律章程。这就有必要知道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中国”。

顾教授用充分的论据证明,从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出现,16世纪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以降,我们在不同的方面都误识了中国。写过中国的西方人甚众,较早的有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黑格尔、马克思、卢梭、费诺罗萨、庞德,现当代的学者有费正清、列文森和宇文所安等。 xvi

顾教授并不是要去纠正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识,这个任务未免太过巨大。他想要做的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误识的情况?为什么我们无法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文化?西方人所犯的错误主要有两个方面:有时倾向于把中国描绘成蒙昧野蛮的“东方专制”的国度,有时又将中国理想化地描绘成一个由明君统治的尽善尽美的文明国度。这两个极端的观点直到现在依然经常出现,尽管这些误识有时表现的方式当然会有所不同,比如伏尔泰对中国的误解。从正面来说,我们当代西方人认为中国在经济、生产和科技方面发展极为迅猛。我们的媒体每天都告诉我们中国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从负面来说,我们的媒体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压迫

人,新闻管制,违反人权的国度(好像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从来都问心无愧一样)。

《汉学主义》的基本观点敏锐而又复杂。我前面说过,它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在其立论构思方面精细入微。你得自己去读一读这本书才能明白作者到底想要说什么。但是,一个简单的介绍也许会有助于你的阅读。“汉学主义”(Sinologism)是整本书的关键词,它和“汉学”(Sinology)不同。两者的差异颇有点儿像“解构”与“解构主义”之间的不同。“解构”是一种灵活的阅读策略,“解构主义”则常常盲目地遵从一套既定的模式,就像人们几乎普遍地错误理解德里达那句名言那样:“文本之外一无所有”(Il n'y a pas de hors-texte)。

“汉学”是西方学术界从事中国学术研究的通常称谓。它就像英语中大量带有“logos”后缀的词汇一样。“logos”源自希腊语,意为思想、知识、词语、节律、比率和依据等。在基督教里,“基督”在圣约翰·福音那儿就是逻各斯,在英语中就是言语的意思,但在基督教神学里,“基督”也是创世万物无所不在的基础。以“logy”作后缀的词一般都有“某种知识”或“某种学问”的意思,英语中有“神学”(theology)、“地质学”(geology)、“意识形态”(ideology)等等,甚至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创造了一个新词“logology”,即“逻各斯”之学。

“汉学主义”(Sinologism)是顾教授新创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常常未被意识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种种假定,构成了操控西方学者对中国研究的隐性逻辑。这个逻辑是“无意识的”,因为它被人们如此自然而然地接受为常理,以至于受此影响的人们对此视而不见。顾教授在“结论”中写道:“很少有做汉学研究的学者意识到这一事实,即他们受到一种无意识的动机的影响,这种力量控制着他们做学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xvii 顾教授的“文化无意识”接近于但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也接近于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无意识”。其不同之处是,顾教授并没像马克思和阿尔都塞那样去强调汉学主义意识形态对生产、分配、消费这一无所不包的物质过程的

依赖。其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无意识”概念的不同之处是,顾教授的“文化无意识”既与性压抑无关,也和普遍原型无关。

尽管顾教授的这个术语源自弗洛伊德和荣格,同时也受到詹明信《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启发,但顾教授所阐述的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他们截然不同。顾教授令人信服地驳斥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他认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对中西研究并不完全合适,原因是萨义德的观点产生于西方国家想要控制、殖民近东和中东国家的语境,而在历史上西方从未征服过中国。

顾教授的“文化无意识”和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不同之处是,它并不具备显性的政治维度,更多的是涉及被西方人所曲解的中国,而这些曲解却被认为是客观的、学术的。这些曲解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将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运用到一种并不适宜这些理论的文化中去。

顾教授指出,

汉学主义化是一种未有明言但心照不宣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方法的体制化,这种方法以西方认识论视角观察中国,并拒绝或不愿根据中国自身情况去认识中国文化;这种方式根据西方方法论研究中国材料并生产有关中国文明的知识。西方方法论往往无视中国现实并简约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使之能被纳入以西方模式为蓝本的简单化发展模式。

《汉学主义》一书举出了现实生活中大量令人沮丧的“汉学主义化”的案例。

顾教授这本书最显著的一个方面是他详尽地论述了当代中国学者在多数情况下已受到“汉学主义化”的影响。他们用西方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国家,和西方学者一样曲解着中国。我们西方人或许并没有

以占领和奴役的方式殖民过中国,但我们却殖民了许多中国学者和普遍民众的思想。我们说服中国人相信中国比不上西方,西方认识论可完全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顾教授写道,

xviii

盲目地接受西方的思想、理论、模式造就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汉学主义。我认为有意识地承认西方比中国优越,通过宣传、教育、大众传媒、出版物等自觉地促进和加强了这种意识,以至于这些认识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并积淀为一种文化无意识。这种文化无意识是使得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再现,并对中国文化成就做出了一系列错误评估的内在逻辑。

《汉学主义》一书在结尾部分发出意味深长而又高尚的呼吁,作者吁请大家逃离汉学主义的迷宫,回归公平客观的学术,尽管这一点是比较难以实现的。我因长期从事西方文艺批评的工作,更明白这有多么难。甚至当你问关于一个作品“它的叙事前提是什么”时,也受到先人为主的成见的影响,比如此处,你就假定了这个叙述习惯一定有助于产生意义。我相信情况的确如此,尽管我沮丧地怀疑这种想法是否就是我的文化无意识。顾教授写道:

虽然在学术研究中彻底撇开政治并不完全可能,我们仍需努力实现纯粹客观的学术生产,并将为知识而生产知识作为理想,而不是生产顺应意识形态要求的异化知识。同样,我们虽不能彻底清除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影响,但我们应尽可能地使学术去政治化,并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接近这一理想的一条可行途径就是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的阐释学方法,这一方法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是一部大书,需要反复研读并不断予以全新的阐释。

顾教授撰写的这本书正是他所提倡的“为学术而阐释学术”的一个典范。

顾教授的《汉学主义》一书非常有力而且令人感动。阅读它使我大开眼界。它使我更加不愿意仅仅凭借自己十多次去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就草率地对当今中国做大而化之的概括。我曾多次访问中国,亲眼见到中国这几十年突飞猛进的变化,这些巨变令我非常震撼,同时也使我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多么复杂且具有挑战性,而我对中国又是多么无知。如果说众多知识渊博的学者都误读了中国,那么我怎么可以认为我理解的中国就一定是对的呢?《汉学主义》使我意识到自己是如何不知不觉地受到“汉学主义化”的影响。当我把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付诸实地检验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基于西方媒体或是西方中国专家告诉我的看法几乎都是错的。比如我怀疑在中国教授文学的方式是由专制的官僚机构所强行指定的。一位可靠的中国信息提供者,她自己就是一位女教师,以详尽的资料使我相信,中国的教师在课堂上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教授文学作品,他们也可以选择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心照不宣的限制当然存在,美国的文学课堂也有类似的限制。前几天,我从在中国认识、后来一直保持电邮联系的一位学生那里获知,在中国有许多网站,上面载有原创小说,它们拥有大量的读者。这样看来,中国在用网络保护文学创造力方面似乎比美国做得更好。这是另一个让我对中国文化感到惊讶之处。

我诚请看过这篇序的读者们赶紧读一读这本书的正文,它是一部令人激动的学术和分析的杰作。《汉学主义》为中西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作出了贡献,它学术深厚,涵盖面广,其高度原创性的理论范式使全书极具说服力。“汉学主义”作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具有建设性的价值。

2012年1月26日

于缅因州塞奇维克镇





## 致谢

在此书写作过程中,有幸得到来自多方人士的宝贵建议、帮助和支持。首先,本书的完成要归功于作者在过去十多年工作过的两所高校。一是我先前就职的田纳西州罗慈学院。我在该学院荣获了几次教师发展基金奖励,其中一部分资金使我得以在美国和中国搜集资料并开展最初的研究。二是我目前任教的达拉斯德州大学。在此期间,我荣获了教师发展特别研究资金,这使我能够获得一学期的时间不必教书而专心研究此书的课题,并将以前写的一些章节加以整合以适合出版。此外,我也非常感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2010年夏我在该院访问期间修改了本书的全稿。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一些来自世界知名学者的灵感、洞见、专业意见和发人深省的建议,他们是:加州大学厄湾分校 J. 希利斯·米勒教授,芝加哥大学 W. J. T. 米切尔教授,杜克大学周蕾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李泽厚先生。我们通过信件、会面、电话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厘清本书的研究视野和确定可行的研究方法时,周蕾教授非常谦和地提供了帮助和建议。她不顾自己繁忙的日程,评阅了我的研究计划,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本书初稿完成后,我将一些主要章节交给我所在学院和其他高等研究机构的同事和朋友们阅读,寻求他们的看法和批评。这些学者们包括 J. 希利斯·米勒教授,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丹尼斯·克拉兹教授,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弗雷德里克·特纳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教